

张玉兴 选注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辽 沈 书 社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张玉兴 选注

辽沈书社

1988年·沈阳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Qingdai Dongbei Liuren Shi Xuanzhu

张玉兴 选注

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528,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插页: 2
印数: 1—1,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 发

责任校对: 张 华

封面设计: 邹君文

ISBN 7-80507-000-3/I·1

定 价: 6.15 元

龙庭亦是豪游地 海月边霜未觉愁

序

收到《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书稿，一口气读下去，兴味盎然，不忍释手。这是一部好书，选注者张玉兴同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欢迎和赞扬。

清代前期，有大批“免死减等”的罪犯被流放到东北各地，主要是沈阳、尚阳堡、宁古塔以及伯都讷、船厂、卜魁、瑗珲、三姓等地。流放的人数达十几万人。那时候，这些地方开发的程度低，人烟稀少，环境艰苦。有人描写去宁古塔途中“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噪。行者或踣其间，或僵马上”（《吉林通志》卷一百十五）。流放的罪犯大多是专制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他们来到陌生的、艰苦的环境中，为自身和家庭的生存而顽强的奋斗，将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带到东北，为开发和保卫东北边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流人中有一些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南方，因种种罪名流放到边疆，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留下了许多诗篇。谢国桢先生的《清初东北流人考》曾着重介绍了他们被发遣的背景、戍地、流放生活以及诗歌创作的情况。古语云：“诗言志，歌永

言”。诗歌是心声的记录。这些不幸遭戍的骚人墨客，将自己惊险艰难的遭遇，思慕哀怨的感情，奇特新鲜的见闻都形之笔墨，托于诗歌。就象因丁酉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兆骞所说：“由来才士，半多飘蓬，自古羁人，偏多篇翰”（《方与三其旋堂诗集序》）。“由来志士，遭此穷途，未有不凭柔翰以消忧，托长歌而申恨者也”（《孙赤崖诗序》）。他们居然在流放地结下诗社，相互唱和。如函可和尚与左懋泰等在沈阳组织“冰天诗社”，参加者达三十三人。宁古塔则有“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穷愁中亦饶有佳况”（吴兆骞：《寄顾舍人书》）。吴兆骞评论流放诗人说：钱德维（钱威）“议论雄肆，诗格苍老”；杨友声（杨越）“诗甚清丽”；苕中三钱（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兄弟）“才笔特妙”；姚琢之（姚其章）“诗如春林翡翠，时炫采色”；张坦公（张缙彦）“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陈雁群（陈志纪）“唱酬亦富”。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写出的这些诗章，不同凡响。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离乡背井、颠连困苦的流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接触到众多的贫苦人民，而且万里远戍、跋涉山川，见多识广，所以他们的思想更加敏锐、眼界更加开阔、感情更加强烈、笔墨更加精警。他们作品中反映的自然界和社会界，更加真实、宽广和深刻。他们的诗风，或沉郁、或哀婉、或激昂、或悲怆，吐露了生活中的酸辛与不平。从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在清朝高压政策下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可以认识到东北各民族劳动和斗争生活，可以欣赏那里山林川泽的雄浑壮丽，也可以领略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

尽管流人的诗作，有许多精采的篇章，但是过去却并没有很好搜集、选择、刊印，致使很多流放诗人湮没不彰。他们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大多数人殁戍所，少数人即使被赦回

乡，也多在潦倒中终老一生，因此许多诗作都散失不传。例如，本文前面所举吴兆骞评论过的八位流放诗人，多数人的诗作早已不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沈德潜编《国朝（清）诗别裁集》，收集清初至乾隆初年诗作者达九百余人，其中仅有流人诗作者十二位，选诗五十余首。在清廷大规模禁书、焚书之前，情况已如此，可见流人诗作散失之严重。民国年间，徐世昌辑二百卷本的《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人达六千一百余家，是迄今最宏富的一部清诗选。该书还特别注意收辑一些不甚著名的诗人及一些流传稀少的诗作，但流人诗作者也只收了十八位，共录诗七十余首。五十年代，邓之诚先生编辑《清诗纪事初编》，只收流人诗作者十二位，录诗十余首。在这三种诗集中，上引吴兆骞所评论的八位诗人，一位也没有。可见流人诗的遗漏散佚是十分严重的。

玉兴同志有感于流人诗的重要及其散失的情况，决心收集、选录东北流人的诗作，并加注释，以期给大家奉献一部反映清前期东北地区历史事件和社会风情的诗集。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完成了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这是一部有份量、有水平的资料性、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辑佚钩沉，搜罗丰富，考证精当。本书选流人诗作者四十八位，诗五百五十八首，另附六位赴戍所探视者五十六首诗，共计收诗人五十四位，得诗六百一十四首，成为迄今为止搜罗流放诗人及其诗作最丰富、最完备的选本。这里既选有名家巨子，也有行迹不著的普通文士。其中有从经过多方搜寻发现的传世诗集（现共发现十九位流放诗人有传世诗集）中选录者，而大部分诗人之作却是从方志、笔记和其他人的诗集、文集中仔细搜寻得来的。这种“披沙拣金”的办法需要翻阅

很多书籍，付出长期艰苦的劳动。这部分诗篇所选虽少而用力最多亦颇繁难。玉兴同志还用了一番考证核对的功夫。如本书所选左懋泰诗七首，除一首选自函可《千山诗集》卷二十“冰天社诗”中外，其余六首均注明选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修《铁岭县志》。查今通行的《辽海丛书》本以及民国年间重修本《铁岭县志》，虽然这六首诗均赫然在录，却都有明确标识：其中三首为“佚名”或“失名”，另三首为“木斋李呈祥”，并无左懋泰之诗。但玉兴同志认真琢磨发现这些版本的《铁岭县志》中所载之诗夺误甚多，而标明李呈祥作的六首诗中的后四首，在其《东村集》中却查找不到等疑点。进而查阅康熙十六年原刊本，终于发现通行本及重修本的排印之误，从而检得左诗七首（本书选六首），同时又寻绎出其他人一些诗作。于此可见辑佚勘校工作中所下功夫之一斑。

由于选注者的悉心搜辑，目前所能见到的流人诗作者大都汇集此书，这是远远超过前人成就的丰硕成果。

其次，选取审慎，内容充实。玉兴同志经过长期努力共发现五十余位流人诗作者，近万首诗作。经过仔细斟酌、详加推敲、去粗取精，共收录四十八人的五百多首诗。选录的原则是，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凡有作于戍所之诗或反映流放生活之作者，均当选录之例。凡无诗集行世者（此类情形中诗人较多，存诗甚少），酌情放宽选录的标准，不因诗少而遗漏一位流人诗家，做到以诗存人；凡有诗集者便认真选择。此类情形，作者虽少（占总数五分之二），但存诗甚多（占流人诗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故本书所选之诗仅为现已发现的流人诗作的二十分之一。但“尝一菑知一饒之味”（《淮南子·说山》），本书基本上荟萃了流人诗作的菁华，注重了选录反映各方面情况的诗作。使各种内容、

各类体裁、各种风格具备。多而有绪，繁而不紊。本书以形象化的语言记录了清代前期动荡的社会。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众多的人物活动与思想变化，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史事，在这里都有反映。不论是流人的怀念故国，抨击时弊，抒发愤懑，哀叹不幸，还是反映社会生产生活，描状风土民情，讴歌边疆壮丽河山，赞颂各族人民抗俄御侮的斗争，等等，都质朴无华而感人至深。这种写实手法正是清初的诗风。因而本书所选之诗多有“诗史”的价值。其中选录较多的函可、季开生、丁澎、吴兆骞、方拱乾、张贲、戴梓、方登峰等人的诗作，在记录反映清代前期社会风貌方面尤为突出。不少诗人虽因存诗无多而选录较少，但所选之诗无不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东北边疆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俗画，正是春华秋英，千姿百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读完这部诗选，谁也不能不承认流人诗作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均为人们全面了解清前期社会以及欣赏借鉴提供了方便。

第三，存史证史，补史之阙，纠史之谬，证史之疑，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它着重注意收辑证史、存史的珍贵史料。如反映清初于辽东推行招民垦荒授官条例与流放宁古塔的郑芝龙被械离戍所情景等诗篇，便是目击者记录的第一手材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前言》中叙之甚详，此不复赘。这里仅就反映流人思想感情变化的诗篇加以说明。

流放，这本是一种严厉的惩罚，被流放者或单车就道，或全家、全族遭遣，无不经受种种困难而愁肠百结，痛苦万状，本书所选诗作对此有大量生动的反映。但艰难困苦的环境却又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从本书中人们又可以看到一些诗人出人意外地对戍所风情，边塞生活给予某种肯定的评价，甚至表现出眷恋之情。特别突出的是与清廷对抗意识最为强烈的函可终

于吟出“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自嘲》）“无罪还应出塞来……不到天山眼不开”（《寄江南诸同社四首》其四）的豪语。江南才子吴兆骞也发出了“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赠人》），“漫道射雕多健卒，只今文士习弓刀”（《秋日杂述》其四）的强音。他们大多是在风光旖旎的环境中成长的，骤然投身到新的、艰苦的环境，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发生强烈的变化，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突破了文人传统诗的框框，在题材、风格、情感、观点方面产生了飞跃。这就是函可之所以由昔日的“浊世佳公子”（戴遵先《和北里》）成为抨击现实，刚强不屈的“缙流高品”，吴兆骞所以由只知吟赏风月的倜傥才子成为激昂慷慨的边塞爱国诗人的原因所在。从这点看，艰苦的戍所生活反倒成就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伍崇曜在《秋笳集跋》（《秋笳集》是吴兆骞的诗集）中说：“梅村诗原评称汉槎极人世之苦，然不如此，无《秋笳》一集，其人恐不传。天之厄之，正所以传之也。”这是严酷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辩证法。

第四，注释详明，考索透彻。选诗难，注诗更难。本书对所选的每位流人诗作者的生卒年、爵里、字号、身世经历、突出事迹以及著述情况，均考索详备，予以简明介绍。对所选每首诗章的背景、用意、内容，不论时事旧典，均加注释，征引丰富，交待明确，甚便读者。

任何一篇著作都有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来说即使篇章的内容十分明白，但历时久远，背景和原委湮晦不彰，不经解释，后人难明究竟，甚至完全不解其意。面对古籍，人们有时会发出“无人作郑笺”的浩叹，可见注释工作的必要。恰到好处的注释，往往会消除由于时代造成的隔膜，沟通古今的思

想，丰富读者的知识，启发今人顺利地理解古籍的内容。陈寅恪先生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分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柳如是别传》页七）要做到这两点，一般说来注释者需有深厚的学问根底，透彻的研究，以及广博的文史知识与对典籍的轻熟掌握能力。注释好清代东北流人诗作，不仅检验注释者的学识水平、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功力，更检验其对流人所处的特殊背景与行事的研究深度。相对来说，这后一点更为重要。大家知道，清入关伊始便推行高压政策，兴文字狱。一般学人士子多不敢秉笔直书，写诗著文多用曲笔，以隐晦的笔法反映周围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的真相就模糊不清了。而流人著作，由于其人的悲惨遭遇，行踪泯灭，更使人们理解的困难加深一层。因而欲探求流人诗作的真谛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考索。

本书在注释上，特别在“今典”的注释上较有特色，反映了选注者所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功力。如对左懋泰、陈掖臣、吴达、罗继谟、董国祥等人的简介；如指出方拱乾《感时》与张贲《宁古台纪事（二十首之十七）》是咏叹郑芝龙的悲惨遭遇之诗；函可《寿陈令公二首》及李呈祥《再呈陈明府》是歌颂在辽东招民垦荒、关心民间疾苦的代表人物陈达德之诗；吴兆骞以及何世澄、杨宾等诗中所赞美的李召林侍御，即当年揭发吴三桂罪状的福建道御史李棠，等等。虽然仅寥寥数语，却无不是经过认真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倾注着注释者的大量心血。

本书在旧典注释上，认真考索的态度也同样值得称道。在大量征引文献、广备异说的同时并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为参稽。如左懋泰《异石》中“逐五湖”条注释，指出据《吴越春

秋》所载越国灭吴之后，西施为范蠡所携，“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是历来相沿的成说，左诗取意本此。同时又据古本《吴越春秋》及《墨子》等书，说明较为真实的情况是：灭吴之后西施被“沉江”而死。戴遵先的《和北里》“心史”条注释，据引《顾亭林诗集汇注》卷六《井中心史歌·自序》，说明《心史》（又名《铁函心史》）传为宋遗民郑思肖所撰，藏于古井，于明末被发现。这件事曾是明清之际在文化界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致相信，并无异词。戴诗亦奉此说。接着注释者又指出，自康熙年间陆续有人攻其伪，而坚信者又证其真，可谓疑信参半，真伪难分，三百年来迄无定论。方拱乾《游东京城旧址》的“东京城”及“乌禄”条注释中，纠正了清初以来以渤海国的上京为金朝上京的谬误。再如，本书对许多诗中出现的“混同江”的不同指谓，都一一做了说明。这种深入探讨不停留于一般征引，更增强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对读者当能很有裨益的。

历史研究要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清史研究如何深入下去？掌握史实，全面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搜集资料、考证史实，要多渠道、多方面地进行。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清代东北流人诗作中不仅有许多值得领略、鉴赏的艺术妙处，更有值得史家充分利用的有价值的珍贵资料。玉兴同志披荆斩棘而编成的这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为人们研究清史、认识清前期社会、进行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形象史料，同时也为人们全面深入地研究这方面史料开辟了途径。

做为开拓之作，本书也不无可议之处。一是搜集还应继续，选目还应扩展。作者曾拟名此书为“初编”，即寓有需进

一步充实完备之意，所选之诗人及诗篇虽远远超过前人，但仍嫌不够，钩沉索隐，尚待来日。有些资料，如方志、诗集、笔记之类尚大有挖掘之潜力。个别篇目还有斟酌去取的必要。二是注释功夫虽然用力甚勤，但还应加强，特别在略读者所熟知、详读者所未知方面尚可改进。当然古籍注释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科研工作，任何高手也难免出现疵漏，但多下苦功夫，尽量争取完善还是可以办到的。希望续编时在已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更臻完善。

总之，我认为《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是一部成就斐然的拓荒之作，是研究清诗和清史的一份可喜成果。熔文学选本与历史教材于一炉，使二者相得益彰，可雅俗共赏，而有功学林。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和欢迎。

戴 逸

一九八六年一月作于中

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选注的是清朝前期被流放到东北的文人学者于戍所或反映戍所生活的诗作。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为了加强统治，维护王公贵族的利益，从入关伊始便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高压和阶级高压政策。对不利于其统治的言行，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措施。其中将所谓免死减等的重犯，大批流放到东北地区。被流放的人通称流人。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九十年间，被流放到东北者不下十余万众。在当时来说，东北地区为荒寒之地，是令人可怖的“畏途”。不少“衣絮单薄，无以御寒”的贫苦流人，“冻毙于路”^①。而到达戍所者，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南人”，因“既无屋栖身，又无资力耕种，复重困于差徭”，在“苦寒之地，风气凛冽”之中，“颠踣沟壑”^②者，屡屡发生。这些遭遇悲惨的流人成份比较复杂，其中虽然不乏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清政府把这类人流放边远地区，是历代维护社会稳定的刑律之常，是无须置议的。但这众多的流人中，多是罚不当罪的无辜受害者。其中有广大的平民百姓，也有相当数量的官绅文士，这又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特殊的政治需要有关。流人文士虽然多出身于殷实之家，可一旦被流放，大

多家产荡然。到戍所后，尽管待遇比一般流人要好一些，但罪犯的身份，险恶环境的困扰却是任何人也摆脱不了的。

顺、康、雍三朝，被遣发到沈阳、尚阳堡（旧址在今辽宁开原县东清水库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黑龙江城（今黑龙江黑河市南爱辉乡）等地东北戍所的流人文士，有案可查者，多达数百名。其中不少人在流放前即才名素著，被流放后，在困厄的环境中，仍然夺命治学，不废吟咏，勤于写作，因而为后世留下了数目可观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已散佚，但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诗篇仍有近万首之多。尽管他们流放的背景各不相同，思想志趣互异，但无辜被遣，赍志难酬，万里流徙，历尽坎坷的遭遇却是共同的。这就使他们在以汗水、泪水，乃至系以性命的诗篇中，寓情涉物，既深且广。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流人的生活遭遇，反映了东北地区的山川物象，风土人情，历史沿革，以及清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抗俄斗争等各方面情况，关于全国性的大事件也多有形象的记载。可以说，这些诗篇构成了光波滢漾的清初社会的历史画卷，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更具有以诗存史、以诗证史的功用，为清代诗坛增添了光彩，为史苑补证了阙疑，而弥足珍贵。

二

现将清代东北流人诗作概括介绍如下。

（一）揭露控诉清朝统治的黑暗与残酷，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流人文士多是以文字获罪者，受遣之后不少人噤若寒蝉，不再敢议论时事。“文章亦祸机”^③，“时危莫论文”^④，可谓痛苦的经验之谈。但实际上，仍然有人按捺不住郁结在胸中

的愤懑，而形诸吟咏。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声言“到死不知非”^⑤的函可。他直言不讳地揭露清廷对人民的敲榨：“画阁已空搜白屋，小民欲尽索穷儒”^⑥。抨击清朝的文字狱是“四海皆秦坑，诗书同一炬”^⑦。谴责清兵的大屠杀：“叹息人间劫尽灰，惠州天上亦荒莱”^⑧。面对黑暗的现实他悲愤地慨叹：“举世令人闷”^⑨。揭露、抨击可谓淋漓尽致。在流人诗家中敢于接触实际的非只函可一人，蔡础云：“饥鹰霜爪摧雀丛，翡翠凋零金弹空”^⑩，这是控诉官府的残民以逞。郝浴更直接讽咏了清廷在近畿一带推行“圈地令”造成的后果：“忆彼畿南民，散步无一椽。新法落官手，满地声呜咽。”“近闻如柴骨，高挂枯林间”^⑪。揭露的正是惨不忍睹的现实。

以函可为代表的流人诗家更着重反映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流人的悲惨遭遇。函可《老僧》一诗描写了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僧的遭遇。他原为躲避后金的残酷压榨而遁入空门，但“依然被桎梏”。二十年后，他返归故里探视，却只见“残败几间屋。不闻旧人声，但闻山鬼哭”！家乡已面目全非。虽然他性命犹存，可是“凄凄恨孤独”，无限伤心的凄凉寂寞之感袭击着他。这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清初东北经过明清之际战乱之后，社会凋蔽的残败景象。而“一度边关即鬼门”^⑫，被流放到东北的流人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函可有关这方面的诗作颇多。在《喜陈子罢役》一诗中，对因年老而被免除徭役的陈子，发出“数茎白发抵黄金”的深沉感慨，并进一步咏叹道：“相逢仙客休言药，若教还童苦不禁”！这是对流人繁重苦役的深刻揭露。《哭吴岸先》一诗发出了“地上莫能容”的感慨，反映了流人的悲惨处境。在另一首题为《闻同难民为虎所食》的诗中，更写道：“只恐老瘦同遭斥，但免饥寒亦感恩”！这是对流人处境血泪控诉的辛痛至极之言。无怪乎李呈祥也发出“埋

身冰壑友朋多^⑬”的慨叹了。

(二) 反映流人思想感情的变化，表达对辽阔边土的热爱之情。

人们看到，占据流入诗作大量篇幅的是抒发流放的悲愤与哀叹及切盼回归的诗篇。有的极念一展长才以报效君亲：“百情久已遣，忽梦入君门”^⑭。“呜呜梦讶参朝晚，乌哺心伤进膳迟”^⑮；有的痛定之后，思归故里：“何时黄菊映归舟，扬子江头，西子湖头？”^⑯但愿望终归落空，愁思萦绕，难以排解。“闻鸡起傍霜庭望，无尽浮云无尽思”^⑰。“梦见关山觉后悲”^⑱！心情之凄苦，思念之悲怆，是普遍的现象。但诗人们并未停留于此。

祖国东北壮丽的河山，苍莽辽阔的边土，以及守卫祖国边疆的英雄军队和各族人民，对流人文士来说，具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尤其是边地豪迈的军旅生活，对他们的感染极深。“从人学射猎，驱马试呕吟”^⑲。“地是阴山学射雕”^⑳，“远随甲骑渡柴河”^㉑。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使他们的眼界为之一开，精神为之一振。久而久之，他们“殊方风俗渐相安”^㉒，“莫言穷塞苦，随俗即吾乡”^㉓。进而感到“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㉔了。尽管他们有各种辛酸痛苦的遭遇，但新的环境，新的经历，却丰富充实了他们的生活，这是平居南国无法想象到的新的生活，从而他们对戍所、对边疆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函可的认识很有代表性：

“无罪还应出塞来，石头旧社长蒿莱。

会稽禹穴饶探遍，不到天山眼不开。”

《寄江南诸同社四首》（之四）

“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